

唯物史观推动中国史学科学化与现代化转向

□ 鲍 金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这些重要论述为我们把握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史学实现科学化与现代化转向中的重要推动作用提供了根本遵循。

唯物史观的独特品格。唯物史观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给予中国史学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向以巨大的推动作用和正确的导向作用。可以说，自从唯物史观参与乃至引导中国史学百年发展历程，中国史学就从传统形态转向了现代形态。

为中国史学的科学化转向奠定正确的价值原则。在人类知识谱系中，发端较早同时又具有奠基意义的学问，非史学莫属。在传统中国，史学历来是一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学问，发挥着探究天道与人事、考察历史演变历程、寻找历史发展规律的重要功能。然而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伴随着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史学开始了自己的曲折探索、百转千回的发展历程。尤其是伴随着西方坚船利炮而来的科学主义，一度压倒了中国史学传统中“铁肩担道义”的历史责任感，代之以对中国的所谓纯客观的研究，强调史学应当借鉴自然科学的方法，倡导绝对客观的史学，反对史学承担为现实服务的历史责任。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给中国史学送来了能够接续传统史学精华、观照时代重大问题、照亮民族伟大前途的唯物史观的科学曙光。与中国传统史学相通的是，唯物史观向

来关注人类历史的宏观走向、关注当代人类的最终依归。这是唯物史观能够揭示人类社会规律、从而具备科学性的重要原因，也是中国人愿意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原因之一。在中国史学的探索 and 整合中，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新中国的史学研究确立了正确的价值指针和科学的方法路径。史学家们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中国古代史进行通史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树立了科学严谨的学风，确立了正确的学术导向。

为中国史学的现代化转向提供行动指南。中国古代有着独特而悠久的史学传统，在历代史官的记载和书写中，在经学学者的论述和思考中，历史真实、历史文本和史学价值成为代学人的学问谱系。中国的历史学人既可以是历史文本的研读书写者，也可以是创造历史的为官执政者，由此形成了中国史学与社会存在有机互动的典型特征。

然而，在近代以后中国社会剧烈运动的应激之下，中国历史学人因应民族危机而开始探索新路，从而开启了中国史学重塑自身、走向现代化的阶段。其中，各种有政治诉求的知识分子纷纷走出注经注史的书斋，公开展示出对国家命运和民族前途的时代探索，如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推动政治变革的话语，各种学社对公共政治空间的营造，以严复译介和陈独秀办刊为代表的政治话语引领，直至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相约建党等政治活动，最终以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为高潮，近代以来一代代知识分子探寻历史规律、拯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复兴的努力获得了“从被动转为主动”的崭新起点。

这一起点给予中国史学的多方面、深层次影响中最大的，便是促使中国史学迎来了从史以载道、以史证

道的传统形态到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现代形态的飞跃。相应地，中国史学也由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深层推动而摆脱了“文明蒙尘”的历史阴影，开拓出唯物史观与中国史学、历史研究与民族复兴、史学进步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尤其是在改革开放的40多年过程中，中国史学依据唯物史观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理论和世界历史的广阔视野，不仅促成了史料的不发掘和文献的大规模整理，而且采用了微观史学、实证史学、比较史学等一系列新的史学方法，不仅产生了历史分期等新的历史学观点，而且逐渐形成了中国史学学派，不仅实现了历史学研究在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等时代重大问题上的出场与发声，而且以自身的自主性研究丰富了世界历史的知识体系，为世界历史知识体系的发展贡献了中国史学的智慧和方案。不难看出，尽管过程漫长、道路曲折，但是中国史学一经由唯物史观的引入和指导，中国史学其面貌就迎来了从历史到现实、从中国到世界、向着现代化迈进的新形态。

推动中国史学从传统到现代的革命性变革。中国史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有着极为丰富的史学遗产和极其厚重的史学传统。从整体而言，1840年之前的中国史学，偏重于历史著述层面的史料编纂和历史精神层面的撰史研史。但是在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危机日渐加深，由此迫使中国史学承担起反映时代精神和应对社会危机的历史重任。

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前途和命运的过程中，也深刻改变了中国史学承担社会责任、赓续时代精神的方式。这表现为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影响和推动下，中国史学从传统走向现代，开始了革命性变革的百年历程。中国史学在唯物史观的人民史

观、群众史观指引下，抛弃了中国传统史学流行的神权史观、天命史观、循环史观等观念，自觉地将史学的历史使命与民族的前途命运相关联，从而表现出新的时代精神。这其中既有关涉中国革命性质和社会性质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也有涉及中国革命的任务和前途的历史研究；既有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等“五朵金花”问题的历史讨论，也产生了马克思主义史家的系列重要著作。当然，中国史学对传统史学的改造遵循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原则，从唯物史观所确立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这一科学观点出发，对复杂历史的丰富历史进行多角度和深层次研究。只有如此，中国传统史学才能在新时代的历史研究中获得新的生机和活力，新时代的中国史学才能将中国传统史学的精华发扬光大。

新时代的中国史学，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中寻找自己的历史使命，要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题中践行自己的历史担当。新时代的中国史学传承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志向和传统，秉持着“一定能够产生理论、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抱负和自信，就一定能够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历史进程中实现历史学的荣光与复兴。



渑池之会引发的变局

□ 崔 庆



渑池之会是老少皆知的历史故事，赵国获得不辱此行的结局，蔺相如的勇武形象也深入人心。但渑池之会的初衷是什么，秦、赵各自有什么设想，秦、赵是否实现了各自的战略意图，探寻这些问题，可以从历史故事走入历史真实。渑池之会如同蝴蝶的翅膀，轻轻挥动，却改变了日后大国角力的走势。

各取所需

公元前283年，蔺相如完璧归赵之后，秦国发动了对赵国的持续系列军事行动，连战连克，占领了石城、狼城等地，歼灭数万赵军。公元前279年，在极为不友好的氛围中，秦在占据优势的情况下，主动示好，约赵国会于渑池。渑池在函谷关外，当时属于韩国，以打消赵国的疑虑。

历史影像中的渑池之会犹如一场戏码十足的娱乐活动，秦国发难，相如护主，赵王鼓瑟，秦王击缶，双方举重若轻，暗中刀光剑影。秦实为求和，却做足声势，咄咄逼人；赵不明全局，只求平安不受辱，丝毫没有与秦争锋之意。渑池之会虽然没有达成任何文盟约，但是对于秦赵两国来说，都具有重要意义。秦王不是故意喝多，相如也非随性逞强，双方通过试探和暗示，赵王获得了与秦王平起平坐的形式满足，秦王确认了赵国不会对秦形成牵制，双方达成了互不侵犯的默契。没有正式协议却产生了有

效约束力，秦赵停止兵戈，结束对抗局面，各自转向其他战略目标，即秦攻楚，赵攻齐。

囿于三晋的复杂关系，避免和韩魏加剧冲突，在潜意识中，赵国没有考虑进入河东地区，直接面对强秦，而以上党为界，向西采取被动防御态度。秦虽然屡战河东，只要不触犯上党，赵国就采取容忍态度，而把主要精力放在东进上，蚕食齐国领土，并希望与秦国再次碰撞前，尽最大可能营造安全的战略纵深。

借势成事

齐国曾经强大一时，和秦并立，呈东西双雄之势。但齐国灭宋，引发五国伐齐，尤其是燕军长驱直入，克临淄，得列城，齐国只余即墨、莒城，苦苦支撑。凭借地缘优势，楚、魏都从中得利，赵国当然也不会放过占取便宜的机会，攻取边境的昔阳。至公元前280年，赵军已经跨过黄河，占领了济水北岸的麦丘，但随着深入齐境，赵国明显感到齐国抵抗尚强，攻克小城麦丘都数费周折。

齐国被削弱，符合秦的长期利益，但是齐国如果迅速衰落，甚至走向灭亡，楚、魏、赵必定自肥自大。一虎去，三狼至，对于秦国来说，是无法接受的。基于这种判断，秦国策动五国伐齐，但不深度介入，甚至在关键时刻“拖后腿”。基于同样理由，秦不断制造与赵国的摩擦，赵虽然蚕食了大量齐国土地，但始终无法后顾无忧，对占领新土进行充分消化、同化。

公元前279年，局势发生了变化，齐将田单扭转乾坤，大败燕军，恢复领土，浴火重生，一个大国再次呼之欲出。秦、赵虽为对手，但对于再次遏制齐国有高度共识，一旦秦、赵相安无事，赵国便可以在东线放手一搏。渑池之会后，秦、赵边境恢复了

难得的平静。赵国如释重负，迅速调整军力布置，主力兵团调往东线专心伐齐，廉颇领军很快攻克了齐国重镇高唐等地。赵国伐齐不遗余力，公元前271年，甚至蔺相如也率军伐齐，攻至齐国平邑。

齐、赵关系紧张，秦国便可“放飞自我”。赵国可能精准计算过渑池之会给自己带来的好处，但一定大大低估了对于秦国产生的“复利”效应。

齐赵相合

秦久经酝酿，渑池之会后聚指成拳，大举伐楚，势如破竹。楚国旧都被毁、宗庙俱失，丧失核心领地，基本退出了江汉平原。此后秦势不可挡，对外打得魏国在河东几乎没有立足之地，对内彻底解决了反复无常的义渠问题，设置陇西、北地二郡。数年之间，秦解决系列障碍后，如猛虎出笼再次鼓荡东进。

秦、赵再次“相遇”，已是渑池之会后的十年。公元前269年，赵国在阨与之战中险胜秦国，清晰地意识到秦、赵大战不可避免，必须尽快寻找可靠的新同盟。三晋各怀心思，楚国江河日下，逐步恢复元气的齐国是潜在选择。齐赵既分，秦国开始了上党外围的清理战，充分吸取阨与之战的教训，分割蚕食、稳步推进。数年之后，长平之战爆发，在战役的关键阶段，赵国内外交困，无奈求粮于齐，齐国袖手旁观，无疑为赵国压上了最后一根稻草。

风起于青萍之末，渑池之会实际上成为引发系列变局的关键一步。看似超强的秦赵会晤，产生了巨大效应，换来长达十年的“和平期”。于秦而言，这是十年宝贵的战略机遇期，积极稳妥地实现了战略意图；于赵而言，这可能是失去的十年，伐齐联齐，摇摆反复，以至于长平败局，居然无一外援，深为可叹。

近期十几头云南野生大象持续北迁的消息一直牵动人心。据调查，象群其实从2020年3月开始就已离开西双版纳进入普洱市。从今年开始，象群首次进入玉溪市峨山县界内，朝着昆明的方向前行。对于这次大象北迁的原因，一些研究者认为是生态环境恢复所致。

一路向南

在中国历史上，大象在不断迁移，但与此次相反，主要是南迁。据考证，四千年前，大象还在中国北部地区经常出现，而今天的野象仅存于中国西南的保护区里。充分的证据证明，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国的大象一直在向南部退却。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呢？

在四千万年以前，大象的分布非常广，除了大洋洲和南极洲外，其他各洲几乎都能发现它们的踪迹，可惜随着环境变迁，现在大象只存亚洲象和非洲象这两种了，其中亚洲象目前濒临灭绝，在我国境内仅存300多头。

而在远古时期，大象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稀缺，我们经常可以在100万年至50万年前的文明遗址中挖掘出大象化石。考古证据表明，大象曾经遍布中国的华北、东北、西北各地，是人们狩猎的对象。在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卜辞中，就出现了商王猎象的文字，“今夕其雨，获象”，描述了商王在傍晚下雨时捕获了一头象的事情。我们比较熟悉的河南的简称“豫”，在《说文解字》里是“象之大者”的意思，也许可以推断地处中原的河南在过去能够经常看到大象。

然而从西周开始，大象的活动范围已经从中原转移到江淮流域，北方人对大象或只是一种“想象”了。至秦末汉初，一部分象群再次从江淮流域南迁到现在的两广、云南以及越南和缅甸一带。当时秦末南海郡尉赵佗趁乱兼并桂林、南海、象郡，建立了南越国，南越国相当于现在的广东、广西和越南北部，其中的“象郡”或因盛产大象而得名。

偶有一些大象还残留在江淮地区，孙权把大象这种土特产送到许昌，成就了“曹冲称象”的美谈。北宋之后，大象在这个地区的踪迹几乎消失殆尽，却在福建的一些地方史料里出现了关于大象的记载。到了近代，大象逐渐聚集在两广和云南地区，但也并不多见。

与当下大象北迁的热点新闻不同，古代中国的大象经历了无奈而漫长的南迁过程。在数量上，大象也从曾经可以组成象队随军作战的规模，进入到现在的稀有保护动物行列。大约自宋朝以后，居住在北方的人们就很难见到大象了，仅在皇家礼仪中才能看见这种可爱的动物。

大象的命运

在深厚的中华文化里，“大象”二字包含了太多的意蕴。孩童时诵读《老子》第四十一章，读到“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往往不求甚解，为求记记，脑子里总会出现一个可爱的大象模样。虽然此处“大象”是形象本源的意思，和咱们今天说的动物大象很不同，但内涵上，“大象”总是象征美好、宏大。大象在中国古代是一种瑞兽，它总与祥瑞相连。因为“象”与“祥”音近，大象还代表着吉祥如意。

大象有着漫长的被人类奴役和屠杀的历史。至少在商朝，大象就被用来作战了，商纣王就曾经使用大象来攻击黄淮之间的东夷部落，正是趁着这次商朝征伐东夷内部空虚之际，周族出兵讨伐而一举灭商。周公旦为了纪念这次伟大战役，创造了礼乐“三象”，内容是表演象乐和象舞。遥想纣王用象队征伐东夷的场景，此时的礼乐表演似乎又带着一丝嘲讽。由于大象庞大而壮实的身躯，在更早的春秋时期，楚昭王也曾摆出“火象阵”：在大象尾巴上点火，接着把它们赶入敌人的阵营。冲进敌营的大象因生理的疼痛而疯狂地碾压、蹂躏敌方兵士，令敌军望而生畏，最终不断后退，纾解了楚国困局。

人们很早就知道大象智商高、通人性，可驯化它们成为载人、载物的工具，还能用来耕种、表演和娱乐。大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已经开始驯化大象，用于宫廷仪仗队。

一路向南：大象的历史际遇

□ 李 轻 尘

明朝时为训练朝会庆典使用的大象，还设置了专门的象房。朝廷在宣武门内西城根就建了一所“驯象所”，并设立大象饲养员“象奴”一职进行专门照顾，乍一听，似乎大象地位被尊崇抬高到超越了喂养者。

到了清朝，大象对于北方人民来说简直太稀奇了，只有部分官员可以在皇家各种仪式中看到。来自朝鲜的朴趾源在《热河日记》中记录了他第一次在避暑山庄看到大象的情形，那时乾隆的仪仗队里有两头大象。据清朝档案记载，乾隆五十八年，宫廷养象的大象数量多达39头，有象房至少42间。如此多的大象对食物的需求量也很大，给清廷造成一定的负担，后来宫廷喂养大象的数量就逐渐减少了。光绪年间，有不丹和印度马戏团来到北平，带来了狮子、大象和老虎的表演，还在颐和园内给慈禧表演了大象戏，慈禧看后非常高兴，给了表演者不少赏赐。到了晚清，随着西方马戏团的入驻，大象不再只是由宫廷御用，而是走向面向大众的舞台。

1880年代，在繁华的上海，交70文钱就能到宝善街的吉庆公栈观看老虎表演，同时报纸上登出“新到一只暹罗大象，可听懂人类语言，会磕头跪谢”的广告。这只大象由来自安南的“象奴”进行引导表演，观看地址是四马路的一品香番菜馆，每人100文的费用远超老虎的70文出场费，可见当时人们对大象的兴趣也较老虎更高。

至民国，大象的遭遇也谈不上幸福，它们要么被送往马戏团，要么进入动物园，无论在哪里，通过表演供人娱乐都无可避免。1933年，上海的文庙路市立动物园购买了一头印度大象，还准备设立水族馆，开展第一届芙蓉鸣禽的比赛，据说报名人数十分踊跃。包括大象在内的这群动物都躲不开被人类训练、围观的命运。

从古至今，大象都难以摆脱被奴役的命运，或作为打仗、交通、表演工具，或成为买卖的商品。人类对大象的捕猎有着很长的历史，对于人类而言，象牙十分珍贵，象皮可以做成盾牌，尾巴可以做成装饰品，这些都成为人类屠杀大象的理由。经历了几百万年的进化，甚至有专家认为它们最终还是会像猛犸一样灭绝。如何避免这种残酷结果的发生，需要我们人类不断反思，并改变我们人类的行为。

